

“有一天重建乡土的前提存在了，我这里所提的问题还是要我们细细研究的。……也许早一些把这些问题着手研究，到重建的时候到来时，不致完全靠一时的冲动去应付，而遭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乡土 重建

费孝通

著



乡土
重建

费孝通

著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重建 / 费孝通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86-9609-6

I. ①乡… II. ①费… III. ①农村社会学 - 研究 - 中
国 - 民国 IV. ①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3696 号

乡土重建

著 者: 费孝通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609-6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编者的话

非常荣幸，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女婿张荣华老师的授权和北京时间玫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促成，我们得以将费老自己选定的他的最重要的四本书——《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乡土中国》重新包装上市，与读者们见面。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虽历经几十年，但对当下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费老书中提到的问题，诸如乡村经济发展、乡土文化建设、乡村重建、婚姻制度与子女养育，等等，即使在当下的中国，也依然存在争议与难点。这也足能说明，当年费老的思想深度与探查问题角度之前瞻性。从来，

基本的问题总是存在，但很少有人去关注，更不用说去深入思考与研究了。这也是费老作为大家，最值得人敬重的地方。

为了保持费老著作原有的风格，再现费老著作的原貌，我们基本保留了费老原来的用字、用词及句式结构，只对一些初始版本的排版硬伤进行了修改。另外，我们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对著作进行了导入性解读。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们穿插放置了一些与图书主题相关的费老的老照片，希望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费老的著作和费老其人。

希望这套书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而不仅仅是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导 读

乡土还能重建吗？

张冠生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

该书由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九月再版，加印两千册；十二月三版，加印两千册。

当时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在短期内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读者的趣味和关怀。

作者和读者心思相通，在书中寄托很深。从动机看，是要讨论当年中国从贫弱凋敝到复兴繁荣的根本思路。从目录看，逐一讨论了如下话题——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乡村·市镇·都会”；

“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再论双轨政治”；

“侵蚀冲洗下的乡土”；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和储蓄的保证”。

这些话题中，包含更多分支话题、从属话题、延伸话题。诸多更具体的话题在目录中看不到，需要读内文，如——

“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

“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

“乡村靠不上都会”；

“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

“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

“资本从哪里来”；

“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

“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

这本初版于整整 70 年前的书，讨论的中国问题既是当时的，也是现在的。白纸黑字，在在皆证。

70 年间，中国已生惊世之变，“乡土重建”的话题却保鲜至今，其间大有关趣。遗憾的是，政学两界似乎都欠缺足够的感应和反应。对费先生的寄托、乡土元气的衰竭、乡土问题的严峻，都还懵懂。

欲懂《乡土重建》，还是先看看乡土社会的损蚀过程。

中国农耕社会有个基础，叫叶落归根，构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这一循环里，人们小心伺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地肥力，以利作物生长，满足生活之需。生活中的所有产物，即便弃物，也都加入循环过程，如落叶化作春泥。

一寸见方的布头，百衲成枕。一缕缕农妇的青丝，编织成木桶的背带。

这是千百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经验。

费先生说：“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看到农民们怎样把土地里长出来的，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很小心地又送回到土里去。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

天长日久，这一循环滋养出桑梓情谊，形成告老还乡的传统。华侨飘洋万里，锱铢积蓄都寄回家，死后也要回乡安葬。

费先生有位祖辈，中举后奉派到云南做官，因瘴气死在任上。其弟为接其灵柩回乡，放弃自己前途，耗时数年，历经艰辛，终得如愿。费先生说，此事在现代文化中会以为毫无必要，但在费氏族谱上大书特书，被评为历代事业中最伟大的一项。

漫漫历史中，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更多的是生前即回乡——或卸任而还，或辞官而返，或遭贬黜而回，殊途同归。更有一直晴耕雨读、终老家乡者，代不乏人。这一群体绵延相续，为乡村社会保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

这类人物，即便跃登龙门，身价百倍，也始终牵挂乡里，极少忘本。不惟不损蚀本乡元气，尤觉有更大责任，维护父老福祉，储备后世所需。修路、造桥、办学、息讼、敦伦……无不尽心竭力。

“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瀚。”这是《乡土重建》的一段文字。

费先生出生于这样的环境，祖辈、父辈也都是这等人物，熟悉得很。他习惯用事实说话，提供实证。为此，他和恩师潘光旦先生做专题研究，统计、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结果是：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6.34%出自城乡之间的市镇。

人才密度更高的直隶、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山西、河南七省中，后四省的乡村百分比超过城市。费先生说：“即以必须很长文字训练才能有机会中试的人才，竟有一半是从乡间出来的。”

城乡各半的这种比例，形成了费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有机循环的一项重要机制，即无论身居城乡，进入社会流动渠道和上升空间的机会大致均等。生为小农无妨，有教无

类，只要刻苦耐劳，勤于求知，同样有上升机会，这就避免了达者越达、穷者越穷的两级分化，维持了社会的平衡。

乡村培植出来的人能为乡村所用，对乡村治理至为重要。费先生的一位老师杨开道先生写过一本《中国乡约制度》，说“中国士大夫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

《乡土重建》的观点曾引起广泛讨论，包括质疑。面对持阶级斗争学说及立场的意见，费先生说：“即使我们说这些人服务地方为的是保障他们自身的地主利益，是养鸡取蛋的作用；我们也得承认这和杀鸡取蛋是大大不同了。”

费先生列举数据、表达观点时，数千年里形成的这一循环，已在近百年历史中被打破。他概要描述这一过程说：“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乡土损蚀始于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于教育失当。由传统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识。新知识要从教育获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灌输的观念、社会风气的流变，使学生不愿回去。

费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批评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他举身边事为例，说“今年暑假很多毕业生找不到职业……有一位老师劝这些青年回乡去……他们几乎一致地说：‘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他们依旧挤在人浮于事的都市里，甚至有靠朋友接济过日子的。”

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政学罪言》初版早于《乡土重建》四个月，其中也有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

潘先生对问题的分析似又深一层。他先说起“维新以还，充满着革命论与阶段论的中国”导致教育观念的演变，接着说教育导向的本末倒置——

“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最后，潘先生说到更严重的问题：“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的毛病，恐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惟延续，且有蔓延，于今为烈。事实俱在，无须多言。

1989年2月28日，费先生与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面谈教育问题，费先生说：“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东西丢了。……再下去就是方针问题。我们应该有危机感。教育的危机就是民族的危机。……应该敲警钟。否则，混都混不下去。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现在我们培养的人，能够承担二十一世纪的任务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迄今已近二十年。当年费先生的“乡土重建”话题又被记起，好像仍有强烈现实意义，且更迫切，“乡村振兴”乃至“战略规划”，证明乡土重建成了中

央政府操心的大事。

客观地看，这确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乃至中叶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工作。

有人重拾当年话题，继续讨论“乡土重建”。

有人拓展这一话题，讨论“乡土还能重建吗？”似乎不敢指望历史上曾经的“充沛浩阔”还能回归乡里。

该不该有点信心？不妨先回到费先生《乡土重建》的文字中，温故知新。

老实说，这本书面世 70 年来，是不是被真正该看的人足够认真地看过，想过，还是个问题。前辈这么厚道，后生总不该太薄情。

2018 年 10 月 16 日

目 录

导 读 乡土还能重建吗? V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001

乡村·市镇·都会 021

论城·市·镇 031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043

基层行政的僵化 055

再论双轨政治 071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085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103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117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131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143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153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165

节约和储蓄的保证 177

后 记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 191

附 录 费孝通先生学术年表 225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 文化结症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地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

“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由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

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词。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 *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